
近代皖籍文人对安徽地区 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

潘如军 陈金锋¹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合肥 230039)

【摘要】: 近代皖籍文人对安徽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留存很多, 涉及面也比较广。安徽地区是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之一, 也是太平军建立政权最稳固、最长久的区域之一。由此, 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的记载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优势与特点。从形式体例来说, 这些记载有记事与杂诗两种; 从记载者的立场来看, 这些记载都鲜明地倾向清政府而反对太平军; 从所留下的记载数量来看, 安徽南北地区数量差异较大。以历史的角度梳理这些记载,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事件被记载的太平天国运动, 也可以看到后人对皖籍文人太平天国记载的“神话”化, 从而坚定对历史事实的探究, 避免做神话制造者。

【关键词】: 近代 皖籍文人 太平天国 安徽地区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8)04-0058-08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 这次运动的足迹遍及 18 个省份, 涉及的城市达 600 多个, 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也有 18 年之久。不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而言, 都为文人墨客们记载历史提供了便利。这些记载大部分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有很高的可信度, 但这些记载绝大部分是分区域进行的, 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记载关联并不是很大,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相互对照; 且在不同的区域文化影响下, 各地记载的方式和叙述的内容也不一样, 各有特色。对于这些记载的收集整理, 学界有很多人做出过努力与贡献。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浙皖太平天国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等等, 汇集了一大批各区域近代文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汇编缺乏有效的分类, 特别是不同区域文人对于本区域的记载。本文希望通过对近代皖籍文人关于安徽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进行分析, 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区域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近代皖籍文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及相关分析

据现有资料, 近代安徽文人对安徽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共有 18 篇, 作者有 13 人, 其中不包括《徽难哀音》中所辑的杂诗原作者(佚名多, 难以统计), 具体统计以及分析如下:

1. 《乱后记中记》, 安徽贵池李召棠;
2. 《凤山笔记》, 安徽歙县黄崇愷;
3. 《徽难哀音》, 安徽绩溪胡在渭;

¹作者简介: 潘如军(1994-), 男, 安徽天长人, 硕士生。

-
4. 《凤鹤实录》，安徽桐城胡澹甫；
 5. 《凤鹤小草》，安徽桐城胡澹甫；
 6. 《蒙难述钞》，安徽合肥周邦福；
 7. 《避兵纪略附钞》，安徽合肥周鸿烜(周邦福之子)；
 8. 《劫余小记》，安徽合肥朱景昭；
 9. 《皖樵纪实》，安徽潛山许枝芙；
 10. 《咸丰以来忠节录》，安徽宿州邵景舜；
 11. 《锁尾吟》，安徽黟县黄德华；
 12. 《颍上城守日记》，安徽铜陵曹蓝田；
 13. 《与鄧太守书》，安徽铜陵曹蓝田；
 14. 《拒诸亲友劝输粟书》，安徽铜陵曹蓝田；
 15. 《癸丑会试纪行》，安徽铜陵曹蓝田；
 16. 《转徙余生记》，桐城许奉恩述，定远方濬颐记；
 17. 《草茅一得·上卷》，安徽桐城戴钧衡；
 18. 《己未会试纪行》，安徽铜陵曹蓝田。

1. 皖南、皖中与皖北文人记载数量差异较大

在对现有资料统计中，皖南与皖中文人记载共 17 篇，而皖北文人只有 1 篇，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皖北地区靠近黄、淮，自古多自然灾害和兵燹，故而形成彪悍民风；而皖南地区丘陵居多，传统的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因而皖南比皖北对“教育”更加地重视，同时也形成了南北差异较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皖北“尚武”，皖南“尚文”。在安徽现存的 415 种地方志中，也能看出皖南和皖北不同的风土人情。不仅如此，仅看南北地方志的数量也有很明显的对比，皖南的地方志多于皖北的地方志。这也是因为“徽州的经济起于徽商，徽商萌于东晋，成长于唐，这也使得徽州的文化成长起来”^{[1]126}，带动了皖南的“尚文”风气盛于皖北。

另一方面，皖南的地理位置对太平军军事活动的重要性也优于皖北，尤其是安庆等地，故而太平军在皖南的活动也明显多于皖北。“是故广阳、故孰，东晋则置为重镇；合肥、寿春，六朝亦代屯坚兵”⁽¹⁾，皖南地区自古就是军事要地，受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皖北，尤其是在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更是异常重视。因为安庆及周边广大皖中南地区是南京的屏障，就连陈玉成也这样说：“天京屏藩惟恃安庆，安庆之得失，关系我之存亡”^{[2]204}，故而使得皖南地区的人民比皖北对战争感受得更真切，自然而然皖南的记载要

多于皖北。

2. 记载形式以记事为主,杂诗为辅

近代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记载的形式,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的形式体例是记事,再辅以大量杂诗。就记事而言,现有资料无一例外地都是依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或依事件的进展顺序叙述。如《凤山笔记》中所记的“三年春二月……咸丰四年正月……五年春……六年春……”^[3],又如《草茅一得》中所记的“七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三……十二月初七”^[4]等等,都展示了此记事方法。这种记事方法可以在很短的篇幅中为我们展示很长一段时间内太平军在某一地区的具体活动,而且还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活动,语言简洁明了,虽然因为篇幅的限制,有不尽详细的地方,但总体而言,这种方式很适合事件的记载。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记载方式并不是安徽地区文人特有的记载方式,其他地域的本土文人也常常使用此种方式,比如记载江苏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江南春楚庵笔记》中,也可见按时间记载事件的原则。虽然都是以此原则记载,但根据记载事件的时间长短,所运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时间较长者以年记载为主,时间较短者以日记载为主,其余以月记载为主。如上文提到的《凤山笔记》明显以年为主来记事,《草茅一得》明显以日为主,又如《凤鹤实录》中所记载的明显以月为主,“四月……五月……九月……”^[5],诸如此类。

除此之外,在近代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中,就杂诗而言,安徽文人运用的最多,就现有资料已经有近 90 余首,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安徽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杂诗记载主要集中在《徽难哀音》与《琐尾吟》中,主要形式以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为主,其内容主要反映当时的太平军活动,以及对所谓“抗贼英雄”的歌颂,以此表达自己的情感。如《琐尾吟》中的《皖城闻警》^{[6]309}。

锋镝楚南天,沿江风鹤宣。祸胎官吏酿,战骨士民冤。

决事斯宜忍,胜残便是恩。可怜机一失,何日扫蜂屯?

诗中描写了 1852 年太平军攻克岳州时的场景,不仅用杂诗的形式写出当时的一些情景,又通过所表达的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何日扫蜂屯”充分地表达出作者的立场。类似的杂诗还有很多,表达的情感或多或少都存在对太平军的敌视,但在“祸胎官吏酿,战骨士民冤”却传达出对清朝官吏的不满。由此我们看到当时皖籍文人矛盾的心理状态。

我们再看《徽难哀音》中选辑的休宁人所作的《狮子谣》^[3]的后四句:

顷刻城亡公亦亡,我闻涕泪满衣裳。

曙后熒熒星一点,崇祠何日祀睢阳。

《狮子谣》是为纪念唐哀侯而作,其因反抗太平军而遭到残害,并被太平军以其“肠肺”祭天。这首诗赞扬了唐哀侯的勇猛不屈,借此来表达对太平军的痛恨。不同于上一首的是,前者写事,后者写人。这也是安徽文人写杂诗的两种方式。

3. 皖籍文人反对太平军的立场鲜明

在分析皖籍文人的立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统计,在现留存的太平天国运动统计名册中,安徽人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如“护殿副典更荣名册”中所记载的 12 名官兵,都是安徽巢湖人;又如“护殿承宣翟第内兵册”中所记的 53 名官兵中,安徽籍的有 25

名,足足占了近一半^{[7]3}。

但在当时安徽文人的笔下,都充分表达了对太平军的反对,更甚至直接将其称为“贼”、“匪”,如《蒙难述钞》中所写:“贼至午时,城外一带皆有……贼枪对城上放”^[5]。在现有的 18 篇资料中,记载的也大多是“太平贼匪”的活动,还有其“恶行”,对此《转徙余生记》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时稚君寄居舟中,泊唐汉,距高淳二十里。一日,与邻妇舟间话,适为两贼窥,遂登舟,命汪某解围,谓奉伪天王诏赴金陵。汪曰:“舟载有姐妹,例不当差,请另觅他舟。”两贼其叱曰:“奉有急诏,虽载姐妹,安能免。”一贼径至稍后,一贼登岸解揽以行。稚君乘其不备,携小婢秋桂,蹑足潜赴邻船……稚君闻贼去远,急招吾乡盐客谓曰:“我夫子去时,以妾托诸君。今贼放舟而去,藉口当差,意实为妾,索妾不得,必回索,诸君幸速为计。”^{[8]509}

这段话描绘了两个太平军借当差为由,强抢民女的事件。类似记载在这些文人的笔中很常见,似乎在当时,太平军就是无恶不作“魔王”,可这与安徽下层人民参加太平军的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莫过于所收集到的留下记载的 13 位作者中,没有一位是下层劳苦人民,都是地主、秀才、商人等。他们要么是自身的命运与清政府息息相关,反对太平军;要么是接受传统教育的读书人,拥护清朝统治。当中最让人注意的应该是读书人,他们大多生活清贫,并没有从清政府的统治中得到什么好处,可依旧“为帝驱除难,臣心失寸丹”^{[6]310},说明他们的思想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可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遗留的记载全部倾向于清政府,为清政府“讨贼、骂贼”,追求“古来皆有死,高洁泰山同”^{[7]313}。而下层劳苦人民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为生存担忧,与当时处于“崩溃的天朝”并没有很深厚的感情,而所谓的“天朝”实际上是压迫他们的最中坚力量。皖籍文人与下层民众对待太平天国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恰恰说明晚清统治阶层的腐朽,也预示清政府统治面临着崩溃。

二、近代皖籍文人太平天国运动记载的优势与特点

近代皖籍文人关于安徽地区的太平天国记载,顾名思义,就是近代安徽本土的文人对于在安徽区域内的太平天国活动等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与特点。优势有二:一是地理位置,二是尚文风气;特点有三,体现在记载数量、记载人身份与记载方式上。

其一,地理位置优势。安徽地区是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之一,也是太平军建立政权最稳固、最长久的区域之一,太平军的领导者与清政府对安徽地区都十分的重视。“安徽向来江南,吴楚分界,第防江皖,南北画界,只争淮黄。”^①就此 1860 年洪仁玕在给李秀成的信中曾这样说过:“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中……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就连清晚期的官员曾国藩也曾说过“中原腹地莫要于皖”^②,这足以证明安徽的重要战略位置,尤其是安徽长江两岸地区。安徽长江两岸地区是南京(当时的天京)的门户。在太平军起初进攻南京的策略中,便是把安徽长江两岸地区作为起点,在占领安徽长江两岸各大城市之后,便长驱直入进入南京。后来清政府收复南京也是从安徽长江两岸地区开始,最终清政府将太平军赶出南京。清政府与太平军在安徽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从 1853 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地区开始,到 1864 年退出安徽^③,经历的战斗总计不下百场。主要的战役有庐州之战、浦口战役、三河战役以及安庆保卫战等,而且涉及的区域很广。从皖南的贵池、铜陵、芜湖、当涂到皖北的亳州、萧县等等,太平军的活动都很频繁。这 12 年的战火,使得安徽地区的人民颠沛流离,大多都亲身经历了这次战争,特别是于安徽的文人而言,他们对这场起义的亲身经历促使他们对此进行有意识的记载。虽然记载的内容、方式等各不相同,但为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活动留下了大量的资料。

其二,尚文风气。自科举制度产生开始,安徽地区就是重要的考生源地之一。据统计,自康熙六年(1667)设立安徽省以来,拥有安徽籍贯的科举状元一共有 41 名。在为国家提供大量人才的同时,也使得安徽尚文的风气得到极大地弘扬。而这些状元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徽州,这也与徽州地区的经济发达与教育相对普及息息相关。明清徽商的兴起,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尊师重教成为当时徽州的标志之一。此外,徽州朴学的盛行、桐城学派的发展等,对近代文学、史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足以说明安徽地区的尚文风气。这种风气使得安徽地区的文人数量与质量相对较高,自然使得很多近代皖籍文人对太平

天国进行有意识的记载。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尚文的风气,也造就了近代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首先,近代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记载的数量在全国占有很大分量,16篇记叙文章与90余首杂诗(就笔者收集的资料对比而言),数量占优,仅居江苏、广西等地之后。

其次,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记载的皖籍文人身份多样。近代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记载的皖籍文人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官员、秀才与将领,还有商人、地主,等等,涵盖了除贫苦大众外的各个阶层。例如《蒙难述钞》的作者便是商人,而其他区域的记载多是武举、官员一类,商人与地主等身份的记载者很少出现。

最后,近代皖籍文人运用杂诗的形式进行记载。近代皖籍文人对于太平天国记载的方式多样,体现在喜用杂诗的新形式,90余首杂诗记载在现有的资料中也是首屈一指。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对近代皖籍文人关于安徽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在这些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活动,近代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还可以看到记载中所体现出的安徽区域文化的特点。

三、近代皖籍文人太平天国运动记载的“历史三调”

“历史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互动?”这是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的开篇内容简介中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不管历史是否存在“事件”、“经历”、“神话”这三个维度,柯文的目的仍是提醒我们,所谓事实与真相多面存在。而在将近代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记载放置于柯文的视角下时,我们会发现近代皖籍文人笔下不一样的太平天国。

1. 作为事件存在的记载

叙事是历史学家常用的手法,所谓的叙事就是运用所有能够得到的资料去叙述历史。高明的历史学家擅长从各种记载、留存的史料以及直接参与者的自述中,将历史串联,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从而表达对历史的解释与理解。这种叙事化的历史不同于直接经历的历史和后人神话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叙事是历史学家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平衡之后,汲取两者的重要内容所形成的、能够体现历史学家愿望的文字叙述。

众多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在这一运动期间,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活动,并更好地叙事化形成历史事件。太平军在安徽与清军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战役,如庐州之战、三河之战、安庆保卫战,等等。在黄德华的杂诗《癸丑正月十二日,闻安庆于十七日失守,城中焚毁殆尽,以诗伤之》中这样描述:

谁教滋蔓难图?楚尾吴头残毒痛。那忍皖江回首望,龙山高初绛云铺^{[6]310}。

从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安庆失守的具体日期应该是癸丑正月十七,也就是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这与郭以廷所编撰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基本吻合。而诗中所描写的战争之后的惨烈景象,也为我们了解安庆保卫战的激烈程度提供佐证。又如在另一首杂诗《十二月十七日庐州失守,安徽抚军江公岷巢【樵】死之》中所描写的:

百废俱经营,将军善用兵。洪州资保障,淝水失长城。

果勇李光弼，忠贞颜杲卿。从公多烈士，凛凛气如生。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四日，庐州失守，江忠源战死。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或多或少对历史学家勾勒历史所需要的地点、时间、人物等要素都有所提及。经过历史学家整合后，这些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会成为叙事化历史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也会为叙事化历史的正误辨伪提供很好的材料。

另一方面，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可以帮助史学家勾勒出更为详细的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重要事件的活动年表。现有的各类太平军安徽大事年表，都将《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如1959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所编撰的《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7]26}的第五章节所录的重要军事活动年表，所参考的资料仅仅只有郭以廷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种而已。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可信度极高，当然这也与作者的水准分不开。在郭以廷所编撰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所附录的参考史料，总计千余种。而关于安徽地区活动的史料参考中，除了各地的府志、县志、奏稿外，近代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也是其最为重视的参考史料。这些事实都表明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作为事件，对历史学家编写叙述化历史有很高的价值。

2. 作为经历存在的记载

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在被叙事化之后，作为历史事件而存在，但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它与过去所经历的历史不可能完全一样。原因是在叙事化的历史中，不可能记录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经历，也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历史经历都对叙事化的历史有用。

皖籍文人对安徽地区的太平运动的记载，除了为叙事化的历史提供材料外，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作为一种经历存在的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活动。

例如《蒙难述钞》便是合肥人周邦福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得来。此人“家世业儒”，又“兼习商业”，几代人都居住在合肥。他所记载的时间为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太平军围合肥城，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城破，共计四十八日。所记载的内容均是他在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而在这些亲身经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战争的情形、平民的生活以及战斗双方的斗争经过：

十六日，吃过早饭，上城头望贼，贼匪将城外一带都扎起筏子来了，空处皆钉竹筏……

二十二日，广勇在筏子上，才看见贼已将城脚下打一个地洞，贼是派放地雷的，幸察觉，贼遂失计……

已交四更鼓后，不意贼在水西门放地雷，城破，贼在城外呐喊，人人心惊胆落……^[5]

诸如此类，都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太平军攻城的具体细节，而不是人们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太平军的组成主体是下层贫苦人民，攻城的手段必然落后。在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太平军攻城会使用不同的工具与方法，甚至于还会借助火药的辅助。除了攻城外，对居民的生活状态的记载也非常之多。在描写中，大多数的居民抱有“心惊胆战”、“哭喊”、“逃离城内”、“以钱财疏通”等思想，这使我们充分了解到战争中的居民心态。

又如《草茅一得·上卷》，这是戴钧衡根据亲身经历所著。戴钧衡及父亲是当地地方义勇的长官，他将自己的战斗经历以及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记载下来。在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种心情，一是对清朝文官武将怯战贪生的无奈，一是对“今日之事”的四点策略，即严军令、求将才、明赏罚、筹大局^[5]。

大多数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都是以其人亲身经历作为素材，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恢复人们所经历的去

之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9]47}。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历史情境与记载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和事会被记载下来,而对叙事化历史有帮助的也只有被史学家提炼出来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很容易就被忽视;另一方面,有能力去记载的人,也因为种种原因,只能限于某一个特殊的人群。比如,前已述及的资料表明,对安徽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多以商人、读书人、地主为主。

恰恰因为这些记载只限于某个人群,而导致这些记载因作者的主观意向而已经被先行进行了重塑,而且无法避免,这也是不能完全重现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梁启超曾经就这样说道:“一个人做一个著作,不论写的是传记、纪事本末、方志还是国别史,都是与他自己的心理需求有关。”^[10]。如同上文所叙述的那样,留下这些记载的皖籍文人是“天朝”的遗民,大多数与“天朝”息息相关,从他们的心理去分析他们的立场,即拥护能决定他们“前途命运”的“天朝”。这就如同柯文所要表达的那样: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这种感觉潜藏在他们心底,每当他们进行一些文字记载的时候,形成的文章总是会夹杂着个人的喜恶,这也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

最后,在这些记载中,我们明显可察觉到的一点是,记载的人总是记载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在《徽难哀音》中收录的一些根本毫无意义的带有辱骂性质的杂诗,可能会描绘出当时一小部分人的心理情绪,可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有没有无伤大雅,对我们勾勒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徽的活动也没有直接或间接性的帮助,记载者不是为了记载而记载,这只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次描述。

3. 作为神话存在的记载

在进行叙述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神话”的意思。在柯文的眼中,历史与“神话”在意图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导致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9]168}。

皖籍文人所遗留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本身就已经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而对历史的一种重塑。历史学家们要做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是,从这些记载中勾勒出作为事件存在的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活动,这与历史学家们所奉行的原则完全一致:从史料中试图全面地勾勒出历史。而另一方面,对于神话制造者而言,并不需要去全面地了解多少,他们只需要找到对他们有用的记载,哪怕只言片语,就可以制造出不同的“神话”。

这些记载的“神话”使得安徽地区的太平军的活动在不同的时期得到了不同的评价,甚至于在极端贬低和高度赞扬之间来回摇摆。

如《蒙难述钞》中的一段话:

三更时,抚台发白布条三千张,条子式样,写‘大清一统’四字,约有三阔一尺长,上书之字系朱文,交与带勇的头目领去,分发各棚,皆缝在左臂衣裹,各人一个,有此暗号,才准下城,无此暗号,不准上城。因无此不准下城,防勇不由分派,无此不准上城,恐有奸细混难入城,城内每日捉奸细,故严防如此^{[5]53}。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守将江忠源为防止太平军混入城内,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这一系列措施十分有效。“城内每日捉奸细”也是在这一系列措施下进行的,是正常的军事措施之一,原文的作者周邦福也认为这是“防贼之良策”。可对于某些神话制造者而言,他们不会从整体去认知“城内每日捉奸细”的行为。即使他们知道,也会视而不见。他们会将其塑造成清军守城士兵们心惊胆战的象征,体现清军的“弱小”,来衬托太平军的“高伟”。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究其原因,皆因时代的不同,对发掘历史的目的不同。这不同于历史学家,神话制造者往往会把记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从而形成符合他们利益的“神话”。

再如《凤山笔记》中的一段话：

五年春，下游之贼复至。怒其民降顺也，将尽杀之。民惧，乃复为贼向导^[3]。

这是一段很平常的记载，是人民在恐惧中降服于太平军，为其服务。但对于后来的神话者而言，民“复为贼向导”变成了人民拥护太平的代言词，产生了不同的语境。

再如《琐尾吟》中的一首杂诗：

扼要羊肠崮不平，一夫当关万夫惊。贼偏暗度陈仓坂，军竟全颓细柳营^{[6]333}。

这其中描写的是青阳土匪引太平军由无路山坡窜入，导致清军腹背受敌而战败。在《琐尾吟》中，不止一首杂诗描写到“土匪”为太平军引路。而在神话制造者的眼中，“土匪”为其引路，正好展示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拥护，但是“土匪”能代表人民？答案是否定的。这可能是历史学家应该去论证的，但对于神话制造者而言，摘取只言片语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是他们的任务。

当然，对近代皖籍文人太平天国运动记载的“神话”不止这几例，也不只是近代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被“神话”。大多数后来者对历史的重视程度，远远也比不上他们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去对历史事实进行修改，历史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这样在不同的时期被刻意地贬低或拔高，导致的结果是这可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历史。

近年来，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学界已经开始进入了反思的阶段。我们无需将其过分地夸大，也无需将其过分地贬低。我们在看皖籍文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时，应该理解并且学会避免这种“神话”的倾向。也许我们并不能像高深的历史学家一般，从这些记载中挖掘出历史的线索，形成叙事化的历史。我们能做到的是可以将这些记载看成是别人的经历，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成为这些“神话”的制造者。

四、结语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近代皖籍文人因为其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和得益于这一区域的尚文风气，故而他们对于安徽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而对现有的近代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记载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安徽区域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也有着自己的内部特征，即皖南皖北记载数量差异较大、记载以叙事为主杂诗为辅以及鲜明的记载立场。在这些记载中，蕴含着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活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居民生活、当时人民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等各方面的信息。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要分辨记载的有效真实信息，完整地利用这些信息，却不是仅仅拥有历史常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古往今来许多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成为“神话制造者”。在运用这些记载勾勒叙事化历史的时候，应该运用全面、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即使没有高明的历史学家们的手法，也可以成为这段历史的另一个特别的经历者，但不能成为神话制造者。

此外，用近代皖籍文人对安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去展现安徽近代的生活状态，只是途径之一，仅仅用此绝不可能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如现有的记载资料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只是收集到了 18 种资料，对近代皖籍文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整理收集并不是很全，而用这些记载只能勾勒当时历史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对近代皖籍文人对安徽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进行分析和运用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对历史记载进行补充和纠正，而这个过程则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这不仅仅只是对于安徽地区而言，其他地区也应同样如此。其他区域的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也拥有着自己特有的地域特

色,潜藏着本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历史信息。这些对于太平天国区域记载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学界对于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好,还有待后学之人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数量丰富的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载,蕴含着丰富的价值,需要我们去进行正确且有意义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宫为之. 皖志史稿[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 [2] 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稿·陈玉成传[M]. 上海:开明书店,1951.
- [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近代史资料总 30 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3.
- [4]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 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5]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太平天国: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6] 南京大学太平天国研究室. 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C]//琐尾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7] 安徽省教育厅. 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
- [8]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太平天国: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9] 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杜继东,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0] 梁启超. 中国研究法中国研究法补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注释:

- 1 见《安徽通志稿·清咸同时太平天国军兵争记》,成文出版社,1985。
- 2 见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刻本《皖志便览卷五·皖中发匪记略》。
- 3 见王安定《湘军记》,影印版。
- 4 见郭以廷《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